

转型社会中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实证

蔡跃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限于再分配更在于初次分配环节。文章借助数理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阶段财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财政制度安排影响要素分配和分配基本格局。初次分配格局确定后,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长期中,财政将通过居民要素结构影响收入分配;(2)我国不同阶段的分配状况是财政体制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结果;(3)构建和谐社会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关键词: 财政;收入分配;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 F8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08)11-0004-12

一、引言

在论述财政与收入分配关系时,国内外学者大多强调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和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通常特指其再分配功能。国外经典文献基本都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以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中间投票理论(Median Voter Theorem)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决定机制,进而是财政再分配对居民收入状况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1; Alesina 和 Rodrik, 1991; Alesina 和 Perotti, 1993; Perotti, 1993)。国内文献也主要讨论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虽然也有少数文献主张从初次分配角度实施相应财政政策,但尚无系统性研究。

事实上,财政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再分配环节,尤其对我国来说,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体现在初次分配环节。本文拟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历程,分析不同时期财政职能定位及财政体制、财政政策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影响,尝试用数理模型进行刻画。

收稿日期: 2008-06-19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题目:我国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主持人:蔡跃洲;编号:20070410113)

作者简介: 蔡跃洲(1975—),男,江西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型和调整,为方便分析,不妨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建国初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赶超战略”阶段;(2)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这期间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基本达到小康,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脱贫战略”阶段;(3)十六大以来,中央的战略重点转向可持续发展,先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战略目标,其核心最后都落实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不妨称之为“和谐社会构建战略”阶段。后两个阶段也可称为改革开放30年。^①

本文将就上述三个阶段下财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集中进行逐一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财政、收入分配及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二、赶超战略下的作用机制分析

1. 赶超战略下的生产与分配

赶超战略下,财政实现统收统支,其目的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更为有效地进行积累。其主要机制是通过扭曲价格的方式,尽可能压低劳动回报,提高资本回报,使得农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剩余尽可能地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用于重工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假定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

$$Y_t = AK_t^\alpha L_t^{1-\alpha} \quad (1)$$

其中: α 和 $1-\alpha$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 t 表示某一时点。

根据马歇尔新古典边际分配理论,在不存在价格扭曲的前提下,劳动和资本的单位报酬应等于其边际产出,于是有:

$$Y_t^{ko} = \alpha Y_t, Y_t^{lo} = (1-\alpha) Y_t \quad (2)$$

在赶超战略阶段,劳动所得基本由国家计划事先规定,单位劳动的所得可以假定为固定不变,即工资率为 w ,而且有 $w < (1-\alpha) Y_t / L_t$ 。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其余部分都归国家所有并全部用于进一步的积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资本所得,也即:

$$Y_t^k = w L_t, w < (1-\alpha) Y_t / L_t, Y_t^k = Y_t - Y_t^{lo} \quad (3)$$

公有制的经济结构意味着居民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要素。与此同时,初次分配中的上述安排意味着居民(劳动者)收入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并长时间维持基本不变。至于收入分配差距则取决于劳动力要素占有的差距,因此大体处于平均分配的状态。

2. 赶超战略下的资本积累及增长路径

假定资本的折旧率为 δ ,那么每一期的新增资本和储蓄(积累)率可以表示为:

$$\dot{k}_t = Y_t^k - \delta K_t = Y_t - Y_t^l - \delta K_t \quad (4)$$

$$S_t = (Y_t - Y_t^l) / Y_t = 1 - Y_t^l / Y_t = 1 - wL_t / Y_t \quad (5)$$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的动态方程有：

$$\dot{k}_t = s_t f(k_t) - (n + g + \delta)k_t \quad (6)$$

方程(6)是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方程。它表明,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k_t)^②的变动率(\dot{k}_t)是由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实际投资 $s f(k)$ 和持平投资 (Break-even Investment) $(n + g + \delta)k$ 这两项之差所决定的。在索洛模型中,储蓄率(积累率) S_t 是外生 \dot{k}_t 给定的,不同储蓄率下的均衡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k^* 会有所不同(见图 1)^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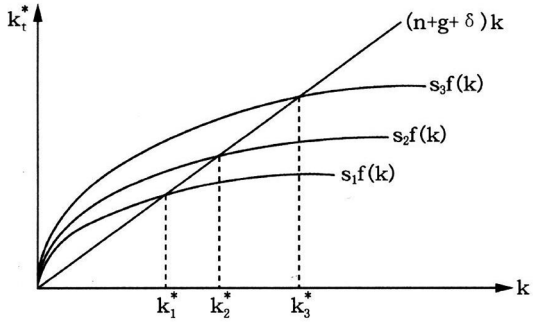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储蓄率下的均衡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根据假设,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以外的其他部分均用作积累,这样每一期的积累率与上一期会有所不同。从公式(5)可以推导出 $t+1$ 期积累 S_{t+1} 的表达式,见下面的公式(7)。

$$\begin{aligned} S_{t+1} &= 1 - wL_{t+1} / Y_{t+1} = 1 - [(1+n)/(1+g)(1+S_t)^\alpha(1+n)^{1-\alpha}](wL_t / Y_t) \\ &= 1 - [(1+n)/(1+g)(1+S_t)^\alpha(1+n)^{1-\alpha}](1-S_t) = 1 - [((1+n)/(1+S_t))^\alpha / (1+g)](1-S_t) \end{aligned} \quad (7)$$

从公式(7)可以看出:(1)当且仅当 $((1+n)/(1+S_t))^\alpha / (1+g) = 1$ 时,积累率才能保持不变;(2)通常情况下,劳动的自然增长率都会低于积累率,这意味着 $((1+n)/(1+S_t))^\alpha / (1+g) < 1, S_{t+1} > S_t$ (见公式(8)),即随着时间变化 S 会不断提高。

$$S_{t+1} = 1 - [((1+n)/(1+S_t))^\alpha / (1+g)] \times (1-S_t) > 1 - 1 \times (1-S_t) = S_t \quad (8)$$

从图 1 可以看出,积累率 S 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当假定技术进步不变时,即意味着单位劳动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而这恰恰也是赶超战略下,压低工资收入、抑制消费的必然结果。

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及单位劳动资本存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单位劳动产出 Y/L 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中, $Y/L = Af(k)$, k 不变时, Y/L 将以 g 的速度增长,即技术进步的速度。当 k 增长,即 $\dot{k} > 0$, k 尚未达到均衡水平 k^* 时, Y/L 将以大于 g 的速度增长,直到 k 达到均衡水平 k^* 后, Y/L 的增长速度才回落为 g 。在赶超战略中,固定的劳动收入会带来积累率 S 的不断提高(见公式(8)),并带来 k 及 k^* 的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dot{k} 会长期处于大于零的状态, Y/L 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也将高于 g (见图 2)。

三、脱贫战略下的作用机制

1. 不考虑财政参与初次分配的情景

脱贫战略阶段,在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公有制演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并存的格局,这意味着私人部门也开始拥有资本要素。为此,不妨将要素分为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劳动三类,并假定社会生产同样服从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于是有:

$$Y_t = AK_{st}^\alpha K_{pt}^\beta L_t^{1-\alpha-\beta} \quad (9)$$

公式(9)中 α 、 β 和 $1-\alpha-\beta$ 分别为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社会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

脱贫阶段,正是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体制逐步向市场体制过渡阶段,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得到根本性改变,放权让利成为财政改革的主要原则。要素分配不再完全由计划所事先规定,而是逐步由市场行为决定。计划体制下的要素价格扭曲现象也得到逐步矫正,但扭曲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初次分配中向资本要素的倾斜,即劳动分配份额小于其贡献份额。不妨先讨论国家初次分配份额为零的情形。在初次分配扭曲下各要素的分配状况如下:

$$\begin{aligned} Y_t^{sK} &= \alpha' Y_t, Y_t^{pK} = \beta' Y_t, \alpha' = (1+r^s)\alpha, \beta' = (1+r^p)\beta \\ Y_t^L &= (1-\alpha'-\beta') Y_t, 0 < \alpha' + \beta' < 1, r^s > 0, r^p > 0 \end{aligned} \quad (10)$$

为了分析脱贫战略下初次分配扭曲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不妨进行如下假定:(1)全社会每一户居民拥有一个单位的劳动要素,总的劳动要素为 L_t ; (2)所有居民分为两类,一类居民只拥有劳动力要素,记其收入为 H^l ,另一类居民则既有劳动力要素又有资本要素,记其收入为 H^k 。第二类居民拥有的劳动要素为 θL_t ,即这类居民占有所有居民的比重为 θ ; (3)劳动的要素收入正好用于居民消费,而居民的资本要素收入则用来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此外,国有资本收益也全部用于积累,这样整个经济体的积累率(储蓄率)为 $\alpha' + \beta'$; (4)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利用两类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记为 H^k/H^l 。于是将初次分配转换为(规模性)收入状况。根据公式(10)有:

$$H_t^l = Y_t^L / L_t = (1-\alpha'-\beta')(Y_t/L_t) \quad (11)$$

$$H_t^k = Y_t^{pK} / \theta L_t + H_t^l = (\beta'/\theta)(Y_t/L_t) + H_t^l \quad (12)$$

$$\frac{H_t^k}{H_t^l} = \frac{\beta'}{\theta(1-\alpha'-\beta')} + 1 = \frac{(1+r^p)\beta}{\theta(1-(1+r^s)\alpha-(1+r^p)\beta)} + 1 \quad (13)$$

公式(11)大致能代表全社会收入的一个基准水平,而公式(13)则能从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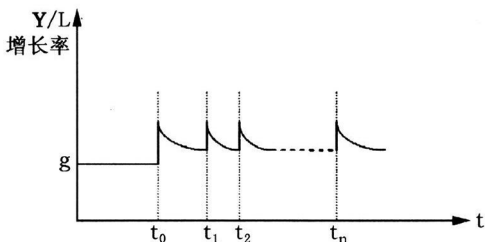


图2 积累率不断提高情况下的人均产出路径

大程度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对公式(11)进行变形得：

$$H_t^1 = (1 - \alpha' - \beta')(Y_t/L_t) = (1 - \alpha' - \beta')Af(k) \quad (14)$$

根据前面分析可知, k 的变化取决于积累率的变化。当积累率 $S = \alpha' + \beta'$ 保持不变时, Y/L 将保持 g 的增长速度, 相应的 H^1 也将保持 $(1 - \alpha' - \beta')g$ 的增长速度。脱贫战略实施的过程也是我国要素初次分配中的扭曲得到逐步矫正的过程, α', β' 逐步变小直到回归到正常的产出份额 α, β 为止。储蓄率(积累率) S 相应的也将逐步降低, 每一次降低都会导致 $\dot{k} < 0$, 并在更低水平上形成新的均衡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k^* 。对于 Y/L 来说, 其增长速度将在原有水平 g 的基础上出现短暂的下调, 然后又逐步回归到 g 。而对于 H^1 来说, 其增长速度由 $1 - \alpha' - \beta'$ 和 Y/L 两部分的变化共同决定。于是 H^1 增长速度将呈现两种变化, 一是会随着 Y/L 做出下弹回归的调整; 二是由于 α', β' 的降低和 $1 - \alpha' - \beta'$ 的上升, 下弹回归的终点将不再是原先的增长速度 $(1 - \alpha'_0 - \beta'_0)g$, 而是变为更高水平的 $(1 - \alpha'_t - \beta'_t)g$ 。

上述变化可以用图 3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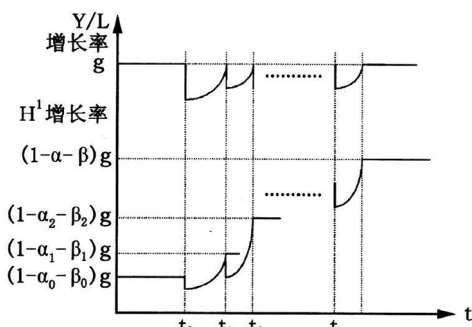


图 3 脱贫战略下的人均产出及基准收入水平增长示意图

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 根据公式(13)可知, 决定差距的参数主要是扭曲程度 r^s, r^p , 拥有私人资本的居民比例 θ , 以及资本的正常产出份额 α, β 。资本产出份额 α, β 基本可以假定不变, 这样收入差距的大小就主要取决于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和拥有资本要素的居民比例这两个因素, 扭曲程度越大、拥有资本要素居民的比例越低, 全社会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

2. 考虑财政参与初次分配的情形

在脱贫战略阶段, 财政的主导原则是放权让利, 增加对微观主体的激励。放权让利主要体现在微观主体(企业、个人等)的一种剩余索取权, 或者说前面提到的通过市场和价格的机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此同时, 国家也会通过税收等方式参与初次分配。为了便于后续的推导, 不妨假定财政分配的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 γ 。^④ 脱贫战略阶段, 我国财政基本上属于“建设财政、吃饭财政”, 因此, 可以假定国家财政收入部分在使用时分为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国有资本的积累, 而政府消费则很大部分用于支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水平与仅有劳动要素的第一类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当。^⑤ 于是有:

$$Y_t^G = \gamma Y_t = C_t^G + I_t^G \quad (15)$$

同时, 前面公式(11)和(12)变为:

$$H_t^l = Y_t^l / L_t = (1 - \alpha' - \beta')(1 - \gamma)(Y_t / L_t) = (1 - \alpha' - \beta')(1 - \gamma)Af(k) \quad (16)$$

$$H_t^k = Y_t^{pk} / \theta L_t + H_t^l = (\beta'(1 - \gamma) / \theta)(Y_t / L_t) + H_t^l \quad (17)$$

H^k / H^l 保持不变,依然是公式(13),但积累率(储蓄率)有所改变,也即:

$$s = (\alpha' + \beta')(1 - \gamma) + \gamma(I^G / Y^G) = (\alpha' + \beta')(1 - \gamma) + \gamma\mu \quad (18)$$

公式(18)中 μ 为财政投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于脱贫战略中要素价格的扭曲会逐步矫正,而财政建设职能也逐步弱化,因此,在动态中 $\alpha' + \beta'$ 将逐步趋于 $\alpha + \beta$,而财政收入中的投资比重 μ 也将不断降低。此外,脱贫战略中财政的放权让利意味着财政分配比重 γ 的不断下降。^⑥ $\alpha' + \beta'$, μ 和 γ 一起下降会带来 $\gamma\mu$ 的下降和 $1 - \gamma$ 的上升,这样仅从公式(18)还无法直接判断积累率 S 的变动方向。不妨对公式(18)进行变形。

$$S = (\alpha' + \beta') - \gamma(\alpha' + \beta') + \gamma\mu = (\alpha' + \beta') + \gamma(\mu - (\alpha' + \beta')) \quad (19)$$

为了判断 $\alpha' + \beta'$, μ 和 γ 一起下降对积累率 S 带来的影响,不妨将下降分解为两步,假定初始积累率为 S_0 ,其他参数分别为 $\alpha'_0, \beta'_0, \mu_0$ 和 γ_0 ,于是有:

$$S_0 = (\alpha'_0 + \beta'_0)(1 - \gamma_0) + \gamma_0\mu_0 \quad (20)$$

$$= (\alpha'_0 + \beta'_0) + \gamma_0(\mu_0 - (\alpha'_0 + \beta'_0)) \quad (21)$$

第一步, $\alpha'_0, \beta'_0, \mu_0$ 下降为 $\alpha'_1, \beta'_1, \mu_1$, 积累率变为 S_1 , 于是有:

$$S_1 = (\alpha'_1 + \beta'_1)(1 - \gamma_0) + \gamma_0\mu_1 \quad (22)$$

$$= (\alpha'_1 + \beta'_1) + \gamma_0(\mu_1 - (\alpha'_1 + \beta'_1)) \quad (23)$$

对比公式(20)和(21)可知, $S_1 < S_0$ 。

第二步,在第一步变化基础上, γ_0 下降为 γ_1 , 积累率则由 S_1 进一步变为 S_2 , 则有:

$$S_2 = (\alpha'_1 + \beta'_1)(1 - \gamma_1) + \gamma_1\mu_1 \quad (24)$$

$$= (\alpha'_1 + \beta'_1) + \gamma_1(\mu_1 - (\alpha'_1 + \beta'_1)) \quad (25)$$

对比公式(23)和(25)可知, S_1 和 S_2 之间的大小取决于 μ 和 $\alpha + \beta$ 之间的大小。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约为 35% - 45%; 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5% 左右;^⑦ 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在 30% 左右。据此,可以认为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大致为 0.3。另外,同样根据国际经验,在政府部门消费占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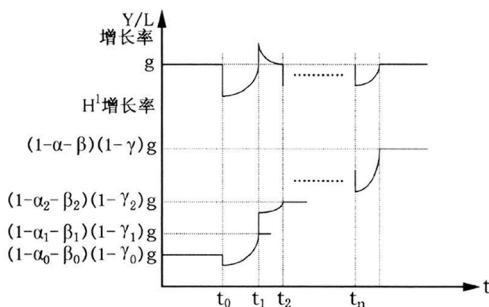


图 4 脱贫战略中考虑财政参与初次分配情况的人均产出及基准收入水平增长示意图

比重大约为 20% 左右。^⑧ 于是,可推算出财政收入中的投资比重 μ 大致在 1/3 左右。而资本的收入份额在通常情况下,大致为 1/3。^⑨ 在脱贫战略初期, μ 和

$\alpha + \beta$ 的取值都会偏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小向正常值趋近。在上述过程中将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 μ 和 $\alpha + \beta$ 两者起点相近,目标取值相近,变动趋势也相近, $\mu - (\alpha + \beta)$ 取值将接近 0,这样 γ_0 下降为 γ_1 对储蓄率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S_2 < S_0$; (2) $\alpha + \beta$ 初始取值明显高于 μ ,且要素价格扭曲纠正缓慢, $\mu - (\alpha + \beta)$ 取值始终小于 0,这时 γ 的下降反而会带来储蓄率(积累率)S 的上升,出现 $S_2 > S_0$ 的情况。

同前面未考虑财政参与初次分配的情况类似,储蓄率 S 的上述变动会在短期内造成单位劳动产出 Y/L 增长率的波动,但在长期中,其增长率依然会趋于 g 。而基准收入水平 H^1 的增长率则在波动中提高,并最终趋于 $(1 - \alpha - \beta)(1 - \gamma)g$ 。

收入差距方面,由于前面假设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水平与仅有劳动要素的第一类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当,因此其影响因素与第 1 部分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四、和谐社会战略下的财政支出结构、初次分配及收入分配状况

1. 相关基本假设

前面两部分建模时仅考虑了资本和普通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这种设定一方面简化了模型的推导,另一方面与这两个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比较吻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体系日臻完善,国民平均教育程度显著提高。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力结构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单纯的简单劳动要素已经不能概括我国劳动要素的基本状况,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已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本,并成为重要的要素禀赋。为了反映禀赋结构的上述特征,有必要将人力资本作为一项独立的要素纳入 C-D 生产函数。

$$Y_t = AK_{st}^\alpha K_{pt}^\beta L_{ct}^\varphi L_{st}^{1-\alpha-\beta-\varphi} \quad (26)$$

同前面公式(9)类似,公式(26)中 α, β, φ 和 $1 - \alpha - \beta - \varphi$ 分别为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复杂劳动(或人力资本)和简单劳动的产出份额,社会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

在和谐社会战略阶段,随着战略目标的转变,政府职能也发生相应变化,财政也由建设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的主要领域是提供公共服务,纠正市场失灵。这些支出也可以划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看作是国有资本的积累;消费性支出除了日常的行政支出外,还包括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这些支出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调节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长期内有利于社会公众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在长期中改变禀赋结构。同前论述类似,不妨假设财政支出为 Y^G ,它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γ ,并分为投资性支出(实物性资本积累)和消费性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两部分。其数学表达式依然是公式(15)。

$$Y_t^G = \gamma Y_t = C_t^G + I_t^G \quad (15)$$

在和谐社会战略阶段,要素价格扭曲进而导致初次分配扭曲的情况在初期还将延续。但随着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这些作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都将逐步趋于消除,因此,为简便推导不妨假设各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分配份额与其对产出的贡献份额相等。于是有:

$$\begin{aligned} Y_t^{sK} &= \alpha(1-\gamma)Y_t, Y_t^{pK} = \beta(1-\gamma)Y_t, \\ Y_t^{cl} &= \varphi(1-\gamma)Y_t, Y_t^{sl} = (1-\alpha-\beta-\varphi)(1-\gamma)Y_t \end{aligned} \quad (27)$$

与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在考虑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均产出 Y/L 的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g ,而且取决于人均实物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即 \dot{k} 和 \dot{i}^c (相关推导略),可以看作是上述三者的线性组合。

$$d(Y/L)/dt = ag + b\dot{k} + c\dot{i}^c, a, b, c > 0 \quad (28)$$

根据索洛模型和前面公式(6),动态过程中,假定技术进步率、人口增长率和折旧率不变,单位有效劳动的实物资本变动 \dot{i} 取决于积累率的变动。与此类似,单位有效劳动的人力资本变动 \dot{i}^c 也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变动。这样,人均产出 Y/L 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实物资本积累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变动。

为了分析和谐社会战略阶段中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脱贫战略阶段类似,不妨做出如下假设:(1)全社会每一户居民拥有一个单位的简单劳动要素,总的劳动要素为 L_{st} ;(2)所有居民分为三类,第一类居民只拥有劳动力要素,记其收入为 H^{sl} 。第二类居民既有简单劳动要素又有实物资本要素,记其收入为 H^k 。第三类居民既有简单劳动要素又有人力资本要素,记其收入为 H^{cl} 。第二类居民占有所有居民的比重为 θ ,第三类居民占有所有居民的比重为 ρ ;(3)简单劳动要素收入正好用于居民消费,而居民的实物资本要素收入则用于实物资本积累。此外,财政支出中的投资性支出也看作是实物资本积累;(4)居民的人力资本要素收入部分同实物资本要素一样也用于实物资本的积累;(5)第一类居民收入既反映了简单劳动要素收入水平,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基准收入,反映全社会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6)居民收入差距则取决于三类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以及后两类居民在所有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一方面, H^k/H^{sl} 、 H^{cl}/H^{sl} 越大,全社会收入差距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拥有人力资本的居民的比重 ρ 会不断上升,并通过将人力资本要素收入转化为实物资本积累而引致第二类居民(实物资本拥有居民)比重的上升,这两个趋势又将不断缓解甚至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

设财政支出中实物性投资所占比重为 μ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计算出全社会的实物资本积累率 S^r 和人力资本积累率 S^h 。

$$S^r = (\alpha + \beta + \varphi)(1 - \gamma) + \gamma\mu \quad (29)$$

$$S^h = \gamma(1 - \mu) \quad (30)$$

2. 财政支出结构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在和谐社会战略阶段,随着公共财政的不断完善,财政投资性支出比重将不断下降,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其他消费性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即 μ 将逐步变小。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率 S^h 将不断上升,相应地单位有效劳动的人力资本变动 i^c 将大于零;对于实物资本积累率 S^r 来说情况则复杂一些,随着 μ 的逐步降低,一方面会直接降低积累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增加又会间接提高积累率,因此 S^r 既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相应地 \dot{k} 也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根据公式(28), i^c 和 \dot{k} 的上述变化将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在 ag 的基础上振荡上行。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上述变化同样会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首先,就收入水平而言,既可以用简单劳动收入 H^{sl} 作为基准来衡量,也可以用人均产出 Y/L 来衡量。

$$H_t^{sl} = Y_t^{sl} / L_t^s = (1 - \alpha - \beta - \varphi)(1 - \gamma)(Y_t / L_t^s) \quad (31)$$

公式(31)表明,基准收入 H^{sl} 事实上是人均产出 Y/L 的线性函数,这再一次印证了两者在衡量收入水平方面具有很高的—致性。因此,可以认为:由实物资本及人力资本积累率 S^r 和 S^h 变动带来的 i^c 和 \dot{k} 变化将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在某个水平基础上不断提高。同前分析类似,我们也可以将人均产出及居民基准收入增长率的变动情况以图示的方式表示,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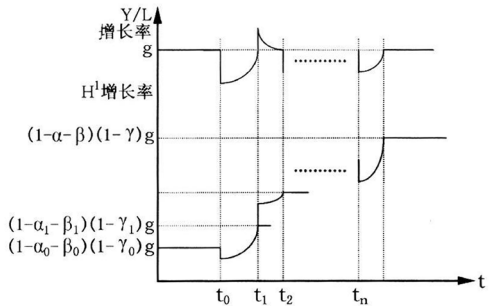


图5 和谐社会战略下的人均产出及基准收入水平增长示意图

3. 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入差距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因此,在最初人力资本拥有者所占比重 ρ 和实物资本拥有者所占比重 θ 相对较小时,随着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第一类居民与其他两类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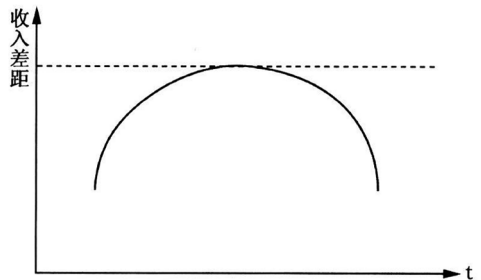


图6 和谐社会战略阶段收入差距的倒U型变化

拉大,这也意味着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但经过较长时间后,随着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积累支出比重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比重 ρ 会不断上升,并且还会引致实物资本拥有者比重 θ 的上升,这些无疑将缓解乃至缩小收

入差距。因此,和谐社会阶段的收入差距将呈倒 U 型轨迹变化。

四、简要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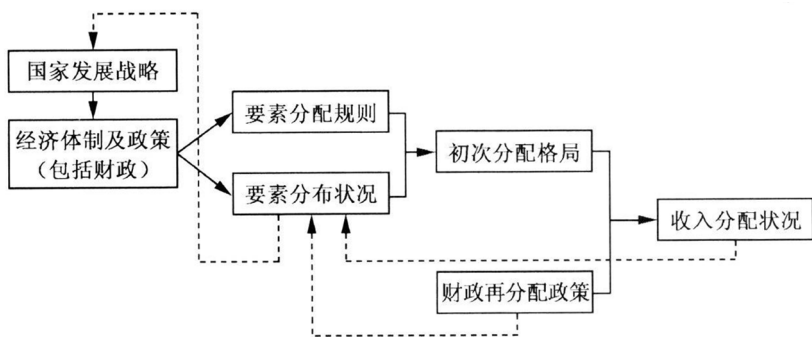
财政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行为,其对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体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不同环节。总结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财政通过参与初次分配,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一方面通过财政方面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变要素在国家、居民等主体中的分布结构和状况;另一方面还可以影响要素参与分配的规则(或者说初次分配的规则)。初次分配格局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格局。税收(个人所得税等)、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动态中,财政通过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包括宏观要素结构和居民自身禀赋结构),将在长期中改变要素的分布格局,从而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及最终的收入分配状况。

2. 赶超战略阶段下,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与其他制度相配合,使居民收入被压抑在较低水平,居民收入分配也比较平均。初次分配中的扭曲在压抑居民收入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的积累速度,人均资本得以不断提高,并促进人均产出以高于自然增长率(技术进步速度)的速度不断提高。

3. 脱贫战略中,放权让利原则得以确立,初次分配中要素扭曲程度逐步降低,财政投资比重以及整个积累率出现下降,劳动的要素收入比重也不断上升,进而带来居民收入增速不断提高。随着少部分人不断积累私人资本,居民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大。

4. 和谐社会构建下,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支出不断增加,普通居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能力得到加强。这将使居民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也将出现倒 U 型变化轨迹。



注:图 7 中实线表示比较静态中发展战略、财政体制(政策)、收入分配等因素间的单方面作用传导机制;虚线代表动态中,各因素的反作用影响机制。

图 7 发展战略、财政体制(政策)及收入分配相互影响示意图

*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赵人伟研究员、张平研究员、杨春学研究员、朱恒鹏研究员、乔丽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研究员、李金华研究员、赵京兴研究员、李雪松研究员、曹曼珠老师等的指导和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 本文划分的“脱贫战略”阶段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阶段是在邓小平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基础上进行的划分。三步走战略具体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前两步在2000年左右已经实现,因为是从未彻底解决温饱发展到生活基本小康、基本摆脱贫困,所以本文将这两个阶段合并,称之为“脱贫战略”阶段。十六大开始,中央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中正式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第三步的具体深化,不妨将这一阶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战略”阶段。

② $k = K/AL$, 即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③ 即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相等,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变动率为零时的单位资本存量。

④ 财政参与分配的途径主要是税收。税收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其中直接税是财政参与初次分配的途径,而间接税则是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是以直接税为主(2003年、2004年、2005年三年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6.5%、6.6%和6.6%)。因此出于推导方便,此处暗含财政收入来源是财政参与初次分配的结果。

⑤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公务员收入基本处于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因此本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财政供养人员收入与仅拥有劳动要素的劳动者相当。

⑥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78年开始到1995年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31.2%下降为10.3%,1996年以后开始有所回升,但直到2001年依然在15%以下,仅为14.9%。

⑦ 参考王卫星等(2004)。发达国家中美国为35%(1998年),法国为49%(1998年),德国为47%(1998年),瑞典为55.3%(1995年),挪威为51.3%(1998年);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为21.5%(1997年),马来西亚为28%(1997年),泰国为19%(1997年)。

⑧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数据计算,2004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分别为18.9%、17.7%、18.7%、21.3%、23.9%、19.2%、19.3%和18.1%。我国为14.5%。

⑨ Romer(2001)第25页对收敛速度进行校准(Calibration)时,认为资本收入份额大致为1/3。

参考文献:

[1] 王卫星.论新时期我国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问题[C].财税改革纵论——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集[A].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Alesina Alberto, Perotti Roberto.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

ment[R].NBER Working Paper,1993,4486.

[3]Alesina Alberto, Rodrik Dani.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1991,3668.

[4]Perotti Roberto.Political equilibrium,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4):755—776.

[5]Persson Torsten, Tabellini Guido.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R].NBER Working Paper,1991,3599.

[6]Romer, David.Advanced mac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M].McGraw-Hill,2001.

The Impacts of Fiscal Regime and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Transition Socie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a

CAI Yue-zhou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s of fiscal regime and policies are not only on re-distribution, but also o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fiscal regime and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Fis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factor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Re-distributional polices only can smooth the distribution gap to a limited extent after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pattern has been fixed. In a long run, fiscal regime and policies af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by factor structure of residents. (2) Th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s the outcome of fiscal regim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objective in China. (3)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is beneficial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which will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and shorten the income gap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iscal regime and policies; 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stage

(责任编辑 许 柏)